

【客家学研究】

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略论 ——以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

肖文评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以韩江上游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 探讨粤东北客家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墟市的兴起与地理因素有关, 而发展和繁荣则缘于区域间的经济分工和地方人文兴盛。墟市贸易的繁荣, 商人对乡村社会的回报, 不仅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为当地文教的兴盛和社会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梅潭河流域地域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墟市; 客家商人; 地域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3)12-0005-10

关于乡村墟市的研究, 因施坚雅主张集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备受研究者关注。^[1] 尽管施坚雅的理论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 但对于传统以来中国社会的分析还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2] 而关于客家地区商人的研究, 近年来因客家研究的兴盛而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 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代表性的如闫恩虎的《“客商”与近现代中国》、谭元亨的《客商》等, 多为宏观论述, 对于了解客家商人的历史、特征、社会贡献等有所裨益, 但关于客家商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则少有论述。本文以粤东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 具体探讨乡村墟市、商人在地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大埔地处岭南山海之间, 有韩江、汀江、梅潭河之利, 在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商业贸易繁盛的社会背景下, 县人在建县前后就已有经商的习俗。明嘉靖《大埔县志》称“恋州之民多力本, 清远之民多逐

末。”^{[3]117} 所谓“清远”, 即清远都, 指大埔县东南部的梅潭河流域。梅潭河发源于福建省南靖县, 经平和县至大埔县三河, 与汀江、梅江汇合而成韩江。百侯墟位于梅潭河中游的百侯盆地中心, 百侯盆地依地理位置分为侯东、侯南、侯北、侯西四片, 现有居民 10 000 多人, 有杨、萧、丘、池四大姓和陈、林、李、钟等十多个小姓。

一、百侯墟的兴起与发展

梅潭河流域百侯墟的兴起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关, 而发展和繁荣则缘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人文兴盛。

(一) 明中后期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随着大埔山区的开发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为商品互通有无提供交换场所的墟市在明代开始出现。在建县之初, 全县有墟市 5 个, 其中梅潭河流域被官府认可的墟市仅有梅子潭市。梅子潭之所以能成墟市, 主要是因梅子碇的阻挡。梅子潭, “下有大小碇、镰刀曲。虽险, 舟可挽放。自此上至牛牯石间, 有五碇, 则至险而舟不能通矣。”^{[3]20} 下游货运只能通航到这里, 因此商民停聚于此, 渐成墟市。“在清远河腰之下, 商民货物, 船止于此。都民日用、饮食, 皆仰给之。”^{[3]29} 梅子潭市因此成为为整个梅潭

收稿日期: 2013-09-3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13TW01-12); 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招标课题(12KYKT01)。

作者简介: 肖文评(1967-), 男, 江西泰和人, 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客家地区历史、社会与文化。

河流域的集市贸易中心。

随着地区开发和人口增长,墟市不断增多,分布越来越密集。至明末,大埔县墟市增至15个,其中梅潭河流域有梅子潭市、赤石岩市、中军营墟、百侯墟、枫朗墟5个。百侯墟位于河边,“路通漳泉”^{[4]卷1},是由韩江流域通往福建漳州、泉州的主要通道和捷径。

当地人传说,在500多年前的明代中叶,百侯就有墟市。考诸文献,明万历四年知县李汝极因公务路过百侯时,见到山民争着渡船过河赶集。“遇集期,则山间担炭薪、竹木、器物者,蜂拥至。”^{[5]卷21}说明明末墟市已在梅潭河边了。

百侯等地出产柴炭、竹木等,而梅潭河下游沿海出产盐、渔等海产品,相互之间有明显的互补性,商品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二) 清初以后墟市的进一步发展

康熙初年潮州沿海地区“迁界”,大埔地区未受影响。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开放“海禁”以来,尤其是海外贸易合法化后,整个韩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百侯由于人口的较快发展,周边山区逐渐被开发,商品性生产得到发展,促进了墟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能够与百侯墟相竞争的湖寮中军营墟,清初因大族的争夺而使发展颇受影响。中军营墟虽形成于明末,但当地有吴、黄、蓝、罗、邬等大姓,利益所在,成为各宗族争夺的对象。“好事者遂集为垄断之场。后以民情不附,亦聚散不常。迄今康熙丁未年(六年,1667),已报罢矣。”^{[4]卷1}在地方势豪不断插足和干涉下,墟市聚散无常,时开时关。

百侯墟虽同样受大族控制,但士绅对于墟市社会秩序的维护颇为重视。如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因大火而重建百侯墟时,发生纠纷,村中进士杨之徐亲自出面调处,“亲行丈量,通乡帖然。”^{[6]下行述}附墟市因而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至康熙后期,墟市商铺达100余间,^{[7]卷13}成为大埔县仅次于茶阳、三河坝市的

第三大墟市。

(三) 雍乾以来墟市的繁荣与地域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雍乾以来,山区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市场贸易活跃,韩江流域粤、赣、闽之间经济联系紧密。^[8]另一方面,海外贸易合法化,促进了韩江流域经济的繁荣。雍正五年,又废除对南洋海禁,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描述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盛况是“江海云清,梯航云集”。^{[9]卷86}广东更是“东起潮州,西尽廉隅,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10]卷5}潮州府城因而逐渐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

在沿海和山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地处韩江、汀江和九龙江之间的梅潭河流域,自然也卷入了因海外贸易繁荣而兴起的商业大潮中。至清代中叶,随着人文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梅潭河流域逐渐形成以百侯墟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成为区域经济中心。

1. 以百侯为中心的墟市网络

至乾隆年间,地处粤闽之间的大埔人,充分利用韩江及其支流的便利交通条件,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从外部获取资源以维护生存和发展,外出经商成为社会风气。“土田已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资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穿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矣。”^{[11]卷10}

本地商业贸易也因之得到长足发展。至乾隆初年,全县墟市增至20个。位于梅潭河畔的墟市,已构成了联系紧密的贸易网络。上游与福建平和县交界的赤石岩市,“货船至此,起陆挑运。漳泉客货来者,在此雇船,有船长、夫长识认。”下游的梅子碇市,“在湖寮水口,有上碇市、下碇市。凡货船到市埠,用脚夫挑运过山五里许,雇船载。有原行船,亦必将货搬空,船乃得上下。其上、下二市,俱设埠长识认。”^{[11]卷1}在上、下游的码头,设立了埠长、船长、夫长等相关组织,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客货运输

组织。

上下游之间始设于明末的三大墟市,经济相当繁荣。太平墟(即原中军营墟)于康熙十三年改设新村近河地面后,“乡民围居,铺店稠密。每月逢一、四、七日为期。”枫朗墟,“通饶平、平和,每月逢二、五、八日为期。”而百侯墟“与枫朗、同仁相连,乡民辐辏,铺店鳞次。每月逢三、六、九日为期。”^{[11]卷1}以百侯为中心,上游为枫朗墟,下游为太平墟,相距均为20里,为一天可以往返的路程。墟期互相弥补,构成一个完整的墟期时间表,为行商走贩提供了最完美的时间安排和经营机会。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社会的崛起,这一时期全县新增了5个墟市,其中3个分布在梅潭河流域,都在百侯墟的上游。南丰墟距百侯约15里,“铺店十余间,设自乾隆四年,每月逢一、四、七日为期。”永丰墟距百侯墟约30里,“雍正元年毁于水,乾隆五年呈县批准复设。每月逢二、五、八日为期。”广安墟距百侯墟约40里,“设自雍正九年,每月逢二、七日为期。”^{[11]卷1}值得注意的是,这3个新墟的墟期均避开百侯墟期,而与百侯墟期互补,明显具有相容性。本县西北部恋州都的墟市,如较场墟、大麻墟等,均为5天一墟期。而梅潭河流域则3天一墟,可谓交易频繁,贸易活跃,反映这一时期梅潭河流域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随着百侯墟市经济的繁荣,百侯逐渐成为梅潭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并得到周边地区的认同。“就清远一都言之,其近于大河(笔者按,即韩江)者,则以高陂为都会。其属于清远河(即今梅潭河)者,则以百侯为都会。百侯盖居清远之中枢,凡清远河流域之乡里,皆于此赴墟集焉。……人民之秀慧,贸易之繁盛,盖为清远河之冠。”^[12]可见,百侯已成为大埔东南部地区的腹地和中心,是该地区墟市经济的主要交易场所。

2. 完备的墟市管理制度

因墟利所在,墟市往往成为各宗族乃至强宗大房

的争夺对象。杨姓、萧姓自明末以来因科举兴盛而成为当地世家大族,百侯成为梅潭河流域文教最发达的聚落。^{[13]卷25}百侯士绅们以儒家伦理为指导,非常关注墟市的经营和管理。乾隆年间,杨之徐之孙贡生杨必拔,出身于族中势力最大的下二房。自小“有志家政”,为此“不畏强御,不避亲仇”,在墟市上“整市规,毁标场。”^[14]对墟市管理,多有贡献。

至乾隆年间,百侯墟市形成了完备的墟市管理制度。乾隆十八年(1753)竖于墟市的《通乡公碑》,对墟市经营和管理有明确的规定,全文如下。

法言云,一哄之市,必立之平,矧在万宝之聚乎!倘权量不划一,殊非盛世醇厚之风。兹通乡绅耆会议,公置铁字斗八个,铁字升八个,并编乾、坤、坎、艮、震、巽、离、兑字样。公置天平针秤五杆,编公、正、协、人、心字样。斗、秤俱付墟长收掌。斗、升用七留一,秤用三留二,依序轮换较对,永杜弊端。所有条约,详具于左:

一,米、谷、盐、食,随价低昂,俱用铁斗平量交易。如用私置斗升,予同受非,并罚油三斤,归本墟福德祠用。

一,杂货、咸鱼、猪、鸡及一切食物,用秤之处,总以对针为准。如不及针,则过在牙人及卖货者;如既对针,而仍额外多收,则过在买者;如牙人及卖货者,奉承势要,瞻循情面,而于对针外,暗送便宜,则予受同过。以上等弊,一经察出,并罚油三斤。

一,屠行除肠血外,一切花油、肚、脏,俱一上秤。无论时价高低,总以对针为准。其卖猪、买肉价钱,原有行情大势,听其照依时值买卖,无庸拘定。

一,瘟畜、母,不准屠宰。如敢混卖,察出,罚戏一本。

一,斗、升轮换,每墟期一次较对;针秤轮换,每月朔一次较对。

一 墟长工食,议定墟日,每斗一个给钱五文。早晨扛猪,每十斤卖猪人给钱一文。其开铺者,遇节日给钱十文,遇年给钱十文。

已上并经通乡绅耆公议,演戏通闻,勒石永遵。如犯弊款,鸣众公罚。倘敢抗顽,呈官究治。

大清乾隆十八年癸酉孟秋吉旦合乡公立^[15]

由碑文可知,墟市买卖和管理条规由全乡绅耆会议商定,以演戏的方式告知四乡,并刻石碑竖于街头。从墟市组织来看,由墟长负责管理,各行有牙人介绍买卖,还有墟伯公祠以求护佑,组织相当完备。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度量衡问题的规定。依其规则,市面上一切货物交易都必须经过称或升斗来度量,买、卖双方都必须务求公允,不能依势,也不能“卖乖”,否则一经发现,便受处罚。为保证度量衡的准确性,规定了墟长定时实行严格的轮换和校对制度。百侯士绅确立了公平买卖、童叟无欺的交易准则,树立了诚信的社会形象,从而为墟市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调查,墟长一职,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街市的管理一直由墟长负责。墟市有四个出入口,均设有栅门,早启晚闭,由墟长负责。但墟长不是墟霸,没有特权。墟长由墟市中有声望的大商家推荐,由各商家选定,没有任期,不能经商。其职责是掌握度量衡,清扫街道垃圾等,负责市场管理,为商家提供服务。因无钱无势,又不能在地上做生意,因此并非人人愿做。^①

3. 墟市贸易的繁荣

百侯墟市店铺在康熙年间就有100余间,是仅次于县城茶阳和三河坝市的第三大墟市。每当墟期,周边山区居民便蜂拥而至。各地行商亦纷至沓来。货物以种类分行,墟市行类齐全。河边的柴行、竹行最大,牛行在黄沙坝,猪行在街尾,木炭行

的木炭坪,鸡鸭等买卖在十字街,京果、渔盐、油米豆等在直街店铺。

据调查,传统以来,每当墟期,市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为早晨七八点,墟市附近居民上街购买新鲜蔬菜、肉等。第二次为十一二点钟,周边二三十里的山里人挑着山货来了,村人纷纷上街采买。至下午三四点钟,山里人要回家,未卖完的东西只好贱卖,村人便纷纷上街“捡便宜”,从而出现第三次高潮。附近枫朗、湖寮等墟市不过午,而百侯可以延至下午五六点,主要是赴百侯墟者人多,人群川流不息。^②街上店铺,以杨姓人为主,多以祖宗公尝名义开办。其中以下二房人最多,100多间店号中占了七成。外地人在此租店做生意的不少,如丰顺、潮州等地人,在街上开药铺等。^③墟市入口以大米、渔盐等为大宗,而出口发竹木、柴炭、烟丝等为大宗。^{[13]卷10}

三、百侯墟上的商人

百侯山多田少,人口众多,迫使当地人充分利用墟市和市场,建立起外向性的经济模式。除外出经商获取外界资源外,很多人在墟市上经营商业,直接吸取当地资源。因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商人阶层,出现了一些世代经商的商人家族。

百侯墟建在侯南杨氏的地盘上,在墟市中经营商业的人多为杨姓,时有“杨姓人吃街坊”之说。不过,侯北萧姓人在此经商的也不少。经营规模较大的有竹木商、杂货商等,而影响最大的是烟商。百侯著名的烟商,有杨梦奇、杨宗擢等。

百侯商人中,最著名的是烟商杨梦奇(1669-1787)村人尊称三麟公。相传他经营烟叶,开办“捷足”烟丝批发行,发财经富,资产达百余万两银

^① 2009年9月25日,对YYQ的访谈。YYQ,70多岁,在百侯街经商多年,对墟市历史相当熟悉。

^② 2010年8月9日,对YGZ的访谈。YGZ,50多岁,在百侯街经商多年。

^③ 2009年8月11日,对YGP的访谈。YGP,70多岁,曾任职百侯村委会多年。

子。“公生平愿实业,后于潮州城竹木门内开张捷足烟丝行,发达百余万金。七十多岁,建起高堂大厦文明毓秀诏许堂是也。”^[16] 雍乾年间又至潮州开设“捷足”烟丝分行,获得丰厚利润。先后娶了几房妻子,盖起了诏许堂(即文明毓秀)、眷顾堂等大屋,成为可以与村中官宦相埒的人物。为提高社会地位,在乾隆五年42岁捐资“入监”时,还为11岁的儿子秩觉购得“监生”功名。乾隆二十五年又“例授明经”,购得贡生功名。^[16]

百侯墟市店铺原来分布零乱,不集中。相传在杨梦奇致富后,投入巨资改造百侯街,建了几十间店,将百侯墟店铺联成一体,从而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街市。同时还为村民做了许多善事。相传他打造了许多石磨,租给乡人磨豆腐、米粩等,每天的租金是一块豆干或粩。为支持乡人经商,还提供资金。^① 致富不忘族人,大埔县令洪先焘以其“义行”,特意为其立传“杨梦奇,号醒溪。少贫,胸次豁达,每以远大自期。效货殖,家累巨万。子弟中有善经纪者,辄与资本,一时咸赖焉。至立尝业,建祖祠,皆捐贖不吝。”^{[7]卷17}

另一个著名的大烟商是杨宗擢(1686-1770),又名协强,“及壮,效货殖,家称饶焉。”^{[7]卷17} 经营烟业,开设“贵和”烟丝行,发家致富,家资巨万。先后于村中盖起了三栋大房子——老楼子、百忍楼、德星堂。死后被族人取谥号“创裕”,以表彰他一生艰苦创业,创造富裕的经历。“百忍楼”是杨宗擢于乾隆初年(1736-1740)盖的。之所以以“百忍”为楼名,是他积累几十年为人处世之经验,要求子孙读书要勤奋刻苦,忍受寂寞;经商要以和为贵,忍让为先。教育儿孙要谦躬礼让,不要惹是生非。认为百事和为贵,“百忍全家福,家和万事兴。”后代子孙多遵循祖辈教导,形成经商的传统。^[17]

百侯街著名的“益兴”烟庄,则是由杨梦广(1700-?)开办经营的。杨梦广与其父杨成占都是读书人,但没有考取功名,家中生活贫困,“遂弃儒

就商。”^{[7]卷17} 开办“益兴”烟庄,专营烟叶的收集与批发,并生产烟丝。因为经营得法,获利颇多。于乾隆三十二年,在村里盖起九厅十八井的“敦厚堂”。该烟庄一直经营至清末,因竞争激烈,转营客栈生意,名为“益兴客栈”。^②

四、墟市经济与商人对地域社会发展的影响

墟市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的出现,对梅潭河地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百侯地域社会发展总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一) 由“耕读传家”到士商并重

大埔等山区,至康雍年间生计已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雍正初年任潮州知府的蓝鼎元说大埔因人稠地狭,“崇冈大阜,种稻黍薯芋,如悬崖瀑布,尚苦不给。多佣力四方,则亦未如之何矣。”^[18] 所谓“佣力四方”,即从事工商活动,可见当时工商活动成为大埔人的主要职业。传统以来“耕读传家”的儒家理念,由此也发生了变化。

在康熙二十三年贡生杨士薰在为儿子杨之徐等分家所写的《父支分序》中,还反对经商,认为比较稳健的职业,还是读书和农耕。“诸男勿谓业薄,各能长守不失,则为祖宗根蒂之人。若听诳卖,谓可生放致大,则一去难得,罔有依归矣。人生在世,得意事少,失意事多。所宁者,或耕或读,循理畏法,积累以听其自致尔。”^{[6]上编42} 但至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杨之徐为子孙分家时,所提示的职业就扩展至工商了。“子孙士、农、工、商,务厥恒业。”^{[6]下编83} 由耕读传家到士农工商并重,反映了士绅职业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迁。

再如一生以教读为业的候选训导萧润章,在去世时为三个儿子所选职业,“长耕田,次读书,且必学医,三经商”。^{[5]卷20} 与读书、农耕并列,反映了商业

① 2008年5月3日,对YG的访谈。YG,70多岁,为杨梦奇的八世孙。

② 2009年5月6日,对YGB的访谈。YGB为杨梦广的七世孙。

和商人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虽然百侯人一直重视科举业,并且在科举考试中相当成功,成为粤东地区著名的“文化之乡”,^[19]但“吃街场”的传统,也反映经商成为当地人的主要职业之一。商业和商人为百侯科举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文教的发达为商业兴盛和乡人经商提供了社会保障。

(二) 促进山区经济发展

墟市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繁荣,直接导致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性生产活动,其中以种植经济林和烟叶最为突出。

1. 种植经济林

大埔山多田少,康熙年间一年之产,不够半年之需。^{[6]下编⁴⁴}因而开垦山地,开发山林成为谋生的重要途径。清初以来人口增长较快,烧山开垦者日多,划木、烧炭等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出现了对山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致使山林迅速惨遭破坏,“山濯濯童矣。”从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倏时大雨,百道流潦,泥沙崩塌”,^{[11]卷¹}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但山区居民又不能不以山林为生,以山养人,因此人们在官府的提倡下,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山林,采伐对象出现了由自然林向人工林的转变,成为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清初以来,由于韩江下游地区庞大的木材市场的吸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杉树、松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如康熙三十二年湖寮何姓与蓝、罗等姓打山林官司时,海阳县丞高某在查堪山林时看到,“山丰山系蓝、罗、黄、丘等姓栽种”,“何姓通族坟木共十八处”,“外有他姓共三十三家。”并认为“此乡居民,山多田少,艺木营生,历代无异。不独何氏一姓,合邑皆然。”^[20]可见人工林的种植在大埔山区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主要经营方式。

百侯人多地少,因此四周山岭被各姓充分利用,开垦山场,种植树木。如池姓祖尝山林,至乾隆

年间建祠时,不足经费以出售树木弥补。车头萧姓的饭箩山,种满了松、杉等树木,后“尽划而售之”,获利颇厚。^{[5]卷²¹}杨姓山地不多,因而尤为重视。康熙六十年,族长杨之徐发现祖尝山林被盗砍,异常气愤,当即纠集村民集资,在山中建庙设立神位,以迎神会禁的方式,严禁村民盗砍。其所写《迎神会禁祝词》全文如下。

惟神聪明正直,厥道惟彰;百侯人士,久托慈航。祸淫福善,不替灾祥;有祈有报,戴显其光。念予侯里,人满土凉;耕耘无地,垦及山场。一杉一木,治生之方;凶顽无耻,刀斧是张。旦旦而伐,顿使山荒;弱肉强食,罔顾维桑。相凌以势,含怨谁控;不行会禁,滋蔓成殃。人谋允协,神力是襄;为恶者去,从善者昌。诛之殛之,扶弱锄强;幽求鬼责,明则人匡。革面革心,俗乃返良;爰鸠群姓,醮贳治觞。神威不远,鉴兹衷肠;降之百福,南北同康。^{[6]下编²⁴}

从祝文中可知,当时杨姓人已经在山中种满了树木,“一杉一木,治生之方”,把山林作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但村中人满为患,无田耕作,因此至山中开荒种垦,从而导致垦殖与盗伐的矛盾。盗划山林不仅使山岭荒芜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会导致弱肉强食,引发激烈的社区矛盾和宗族冲突。为防患于未然,杨之徐利用乡人崇信神明的心理,迎神会禁,把山林的控制权交给神明。由此反映,人工林的种植和出卖,已成为山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种植烟叶与“潮烟”生产基地的形成

闽粤地区种植烟草,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由于它“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并有“杀虫兼润苗根”的功效,更由于种植烟草比粮食作物获利丰厚,“一亩之收,可致田十亩”,因而乡民竞相种烟取利。^{[21]卷¹⁶}种植烟叶的高利润,对于人多地少的百侯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由于墟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许多原来从事粮食生产

的农民,都改种烟叶,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种现象,至迟在康熙年间已出现。如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初九,杨之徐在大宗祠担任宗族会文主持时,贴出的《会文引》指出“春朝占春魁,莫大文章;家庙集家贤,洵称乐事。茶烟供奉,几凳自携。”^{[6]下编55}宗族以公家的名义为参加会文的子弟提供茶水和烟叶,说明抽烟已象喝茶一样,成为当时百侯人的时尚。

嘉庆九年所编《大埔县志》,编者特意指出“百侯、同仁一带,竟尚种烟,估客贩运江西发售。种烟之利,比稻加倍。”^{[7]卷13}种烟能获“比稻加倍”的厚利,因而种烟在百侯一带已成为社会普通现象。相传百侯家家户户都种烟,如八百丘、田心岗等一带良田,都种上了烟草。在长期的精耕细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烟叶为中心的作物轮作制度。“百侯、石云等甲,早季多种烟叶,下季继以植芋,其收成为较丰。”^{[13]卷10}在百侯实际上除了早季的烟和下季的芋外,还有一季水稻。烟草在春节过后栽种,间种芋头。五月收摘烟叶后,追加肥料培植芋头。芋头在七月收成后,再种水稻,至九月底十月初收割。如此实现一年三收,既种烟又种粮,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收获更为丰盛。同时百侯人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发展烟叶加工和贩运业。不少人因此而发财致富,买田造屋,如杨梦广、梦奇、宗擢等。他们开办的烟丝场,较大的有“益兴”、“捷足”、“贵和”等。为了扩大销路,一些烟商又至潮州开设分号,扩大经营。当时潮州的烟业,基本为大埔人所控制。百侯所产烟丝,不仅大量销往潮州,而且销往江西、广州等地,成为“潮烟”的主要生产基地。^[22]潮州名产“潮烟”,顾名思义,出产于潮州。但潮州本地不产烟叶,所产多自韩江中上游地区。

蔡鸿生教授曾经指出,在清代国内市场上,有三种显誉大江南北的潮州货——潮州白糖、潮烟和潮蓝。潮烟即刘鄂在《老残游记》第五回所描述的“兰花潮烟”,是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

用的皮烟丝。^[23]这种烟在潮州名为“乌烟”,又名“盖露烟”,专供擦牙齿之用,能使牙齿洁白,并能除齿病。潮烟因有这些功效,远近闻名。据研究,潮州“乌烟”的生产和销售,以百侯人在潮州开设的“贵和”烟丝行最多和最为著名。^[22]而潮州“贵和”烟丝行,即杨宗擢在百侯所开“贵和”烟丝行的分号。因此黄挺认为,“‘潮烟’这种名牌货,实际上是闽粤赣经济区域内地域分工的成果。”^[24]

从乾隆以来,烟丝一直百侯的主要输出产品。至民国初年,“黄烟、水烟各项,以百侯出产最多,次为县城,出品少数。运销省城、上海、南洋,每年约值二十万元。”^{[13]卷十}1934年广东民政厅所编印的《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亦指出,“大埔农产,以百侯菸叶最为著名。”可见,自康乾以来,百侯的烟叶一直是大埔乃至粤东地方的著名特产。

(三) 兴学重教 促进文化之乡的形成

经商可以致富,能较快地改变经济状况,但致富不是主要目标,村民的传统观念还是希望“富贵双全”,即致富改变经济地位后还要求贵以改变社会地位。所谓贵,即取得科举功名,或出资购买官品、功名,成为乡村士绅。因此不少商人在致富后,即出资购买监生、贡生等功名,以提高社会身份和地位。如萧其宽致富后,取得“州同知”的官品。烟商杨梦奇在致富后,先后通过捐纳得到“监生”、“贡生”功名。

对当地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以经商所得,修建书院,隆师课子,培养子弟。如萧元绍(1613-1697),“善营创,饶有产业,建宅于梅树滩。又建书馆,延师训子孙读。”^{[5]卷20}萧其宽经商致富后,于康熙三十年,“于室之右建书斋,名‘从吾所’,延师训子。”^{[5]卷20}

同时设立学租、书田等专项经费,专门用于资助读书应试。如萧其宽“立学租,为延师馆谷。置书田,以鼓励后进。又于郡城买置行馆五进,为子侄族人应试侨寓所。”^{[5]卷20}一些富有者,对族人求

学、考试也予以大力资助。而更常见的是以经商积累资金,为子孙读书业儒创造条件。如杨宗擢经商致富后,子孙得以有条件读书科举,“孙俊章登乾隆己酉(1789)贤书”。^{[7]卷17}

正是由于商人们的兴学重教,促进了百侯科举的发达,为百侯“文化之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 建构宗族,形成宗族社会

随着国家对乡村祖先祭祀制度的放宽,明末清初乡村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建构宗族。以乡村士绅为代表的民间权势为了团聚族人,纷纷建宗祠、立祖尝、修族谱,建立起系统的宗族制度,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商人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后,为了提高在乡村社会中的话语权,往往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宗族建设,捐资修祠堂、设祖尝、编族谱等。如侯南杨氏第一座宗祠,就是富商出身的杨世亨于崇祯八年所建。以侯北萧氏为例,萧氏宗族在建构过程中,商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宗族象征的祠堂,是宗族成员明世系、讲昭穆的神圣空间。萧氏宗祠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但不久即“毁于兵火”。一直至万历年间,庠生出身的富商萧端吉纠合族人,集资于原地重建。^{[5]卷20}但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萧氏宗祠再次毁于战火。

顺治八年萧翱材考中举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后,成为大埔县地方社会身份最高者。回到家中后,鉴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及宗族内部的不和睦,在他的推动下,萧氏族绅以整顿宗族事务为己任,以尊祖敬宗为内容,对宗族进行了有力的整合,将族众团聚于祖宗的周围,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重建宗祠。顺治十六年,萧翱材纠合族人建起了萧氏宗祠。而建筑经费,主要由萧元溥等商人捐助。

萧翱材中进士前,萧氏的始、二、三世祖没有祖尝。萧翱材为了凝聚族人,便以修缮始祖坟墓的机会,倡议族人捐资购买祀田。族人组织“头会”,按男丁人头出谷凑份子,每人一份。积谷经营,购置

田地,于顺治十五年创立了始、二、三始祖祖尝,建立起祖尝等公共产业,每年收取租谷为祭祀祖宗费用,达到聚族的目的。但因各人贫富不同,贫者将“会份”转让给富者。至康熙五十年时,当初所置的376个会份,只集中在10多人手中,也就是说祭祖时只有这些人有份,而其他大部分族人没有份。其中萧元溥的儿子富商萧其宽所占份额最多,始祖份子89份,其宽一人占有了77份;二三世祖份子287份,其宽占了209份,^{[5]卷20}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这一年萧其宽将其所得之始、二、三世祖的份子全部捐出,作为公尝。^{[5]卷20}

捐赠份子仅次于萧其宽的是萧宸贻(1653-1728)。他早年考中秀才,后经营商业,家产丰富。“念二三世之尝无公费,不惜捐所买者归众以供祭。今大宗馨香百世者,公与有力焉。”^{[5]卷20}共捐出54份。

以萧其宽为首的富商捐出私人会份,归属祖宗,名为“义尝”,形成全体族人均有份的完全属于祖宗的“公尝”。每当祭祀,全体族人均有资格参加,从而真正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对于建构等而有序的社会秩序,确立儒家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族谱记载着宗族的源流、世系等,是宗族成员认同的重要依据,因此在建构宗族过程中非常重视编修族谱。萧氏族谱首修于明成化年间,万历年间续修。随着商业的兴盛和商人家族的出现,商人子弟开始参与族谱的编修。明崇祯七年续修的萧元溥、清雍正十年(1732)续修的萧伦先,均出身于商人家族。在乾隆十六年续修族谱的5人中,有3人出身于商人家族。他们不仅出力编撰,而且还出资刊印。

由此可见,随着商业的兴盛和商人阶层的出现,在士绅的倡导下,商人们为了团聚族人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修祠堂、置祖尝、修族谱,因而对建构宗族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五) 投资公益,塑造乡村社会形象

百侯盆地以梅潭河为界分为南北两片,随着地

区的开发和商品性经济的发展,百侯墟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墟市位于河流南岸,北片居民要逢墟必须渡河,方便两岸居民往来成为当地的主要公益。为了繁荣墟市经济,商人们捐资在墟市两岸设立渡口,建造渡船,雇请渡夫。

百侯渡的经营,经历了一个由私营到官营再到私营的过程。在明代建县之初,百侯渡口设于狮子岩,名为永济渡,为私渡,^{[3]32}渡船和渡工工钱由村人捐助解决。村中富商和善士,如杨淮“施渡田”^{[25]卷2},曾捐资济渡,但未成制度。

至万历四年,县令李汝极因公干途经百侯,体验到百侯人涉河之苦,才捐资造船设渡,以为常年经费。^{[4]卷1}百侯渡由此成为官渡。

随着百侯经济的发展与墟市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在永济渡下方又创设了新渡口,名为“下渡”。渡船、渡资等均由钟少溪、林珀垣、罗齐、萧心居捐助,他们都是在墟市中经商的商人。^{[11]卷1}康熙二十九年,狮子岩官渡经费因地方财政改革而断绝。康熙三十一年得富商萧其棠捐助,始恢复正常。“渡工无赏,遂不常守。里人萧其棠见往来艰阻,于康熙三十一年捐施本村溪南田种三斗,载租十二石,为渡子工食,始得日夕常守。”^{[11]卷1}

随着百侯墟市的发展,两岸来往频繁,至康熙年间除上渡、下渡外,商人们又捐资增设了深福渡、双合渡。深福渡位于百侯东部车头坊,于康熙二十三年由商人萧斯诜兄弟、范德衡捐资设立,但租少难以为济。康熙四十一年富商萧应光再捐助租谷二十石,渡口得以维系。^{[5]卷20}位于村口马山下的双合渡,则由商人萧通自、萧资翰捐资设立。^{[5]卷21}

从明朝到清朝,由于商人的捐助,百侯渡口由一而四,大大改变了交通条件,方便了两岸居民的往来。正是有感于此,乾隆年间从陕西按察使任上致仕归家的杨缵绪称“吾乡多义举,其最著者莫如津渡。”^{[26]卷9}“百侯一撮土耳,而好行其德于乡者若此其众,可不谓仁里乎!”^{[26]卷二4}正是由于商人

们对于家乡公益的热心捐助,使百侯村落的社会形象不断被形塑,不仅是大埔的富裕之乡,而且还成为著名的“仁义之乡”。^[27]

结语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梅潭河流域的开发和墟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人多地少的百侯人充分利用市场网络和经济区域分工,大力发展墟市经济,大量种植经济林、烟叶等商品性农业,形成外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墟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村中不仅出现了商人阶层,而且经商成为乡民的主要职业之一。墟市因之成为可以充分利用的重要社会资源,成为当地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村中文教兴起,科举发达,成为岭南客家地区人文中心之一。^[28]可见重商与崇文重教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有些学者认为客家人重文教,轻工商,^[29]这是有失偏颇的。

客家商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山区开发与社会建构,为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0]墟市贸易的繁荣,商人对乡村社会的回报,不仅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梅潭河流域地域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百侯也因之成为“大埔最繁荣名胜之乡”。^[31]

参考文献:

- [1] 任放.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J]. 历史研究, 2001(5): 168-182.
- [2] 周大鸣. 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3] 吴立思. 嘉靖大埔县志[G]. 大埔: 大埔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 2000.
- [4] 宋嗣京. 康熙埔阳志[Z]. 康熙年间刻本.
- [5] 萧惠南. 大埔百侯萧氏族谱[Z]. 1935年稿本.
- [6] 杨之徐. 编年录[Z]. 上海: 泰东书局, 1924.
- [7] 洪先焘. 嘉庆大埔县志[Z]. 清嘉庆年间刻本.

- [8] 刘正刚. 汀江流域与韩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5(2): 70-89.
- [9] 李卫. 乾隆浙江通志[Z]. 乾隆元年刻本.
- [10] 梁廷桢. 粤海关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简燾. 乾隆大埔县志[Z]. 乾隆年间刻本.
- [12] 无名氏. 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白垵[N]. 岭东日报, 1906-12-19(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 [13] 温廷敬. 民国大埔县志[Z]. 大埔: 大埔县政府, 1943.
- [14] 杨元兴. 先岁进士茅庵府君墓表[Z]//杨朝珍. 百侯杨氏文萃: 中卷. 1929: 64.
- [15] 杨国石. 百侯乾隆年间的《通乡公碑》[G]//大埔县政协. 大埔文史: 第7辑. 大埔: 大埔县政协, 1988: 75.
- [16] 杨稿. 文明毓秀杨氏房谱[Z]. 1990年抄本.
- [17] 大地. 百忍楼与百忍歌[Z]//侯中校友编委会. 侯中校友: 第17期. 大埔: 侯中校友编委会, 2001.
- [18] 蓝鼎元. 潮州府总图说[Z]//鹿洲初集. 四库全书本.
- [19] 肖文评. 从“贼巢”到“邹鲁乡”: 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百垵乡村社会变迁[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2): 55-60.
- [20] 何士果. 民国大埔湖寮崧里何氏族史[Z]. 1919年稿本.
- [21] 方履箴. 道光永定县志[Z]. 道光年间刻本.
- [22] 翁兆荣. 潮州烟丝业的历史始末[G]//潮州市政协. 潮州文史: 第5辑. 潮州: 潮州市政协, 1985.
- [23] 蔡鸿生. 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洲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J]. 韩山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1(1): 1-5.
- [24] 黄挺. 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9(2): 26-34.
- [25] 杨纘绪. 谱传备考[Z]//大埔百侯杨氏族谱. 乾隆年间刻本.
- [26] 杨纘绪. 谦受堂诗文稿[Z]. 民国初年抄本.
- [27] 邱植. 槐庭诗集[Z]. 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5.
- [28]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20.
- [29] 黄淑聘.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32.
- [30] 肖文评. 张弼士与客家社会文化文系论略[J]. 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12(6): 10-16.
- [31] 无名氏. 茶阳杂志[N]. 岭东日报, 1903-05-02(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

责任编辑: 李丽娜

A Study on Market , Merchants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Guangdong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AO Wen - Ping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 , Jiaying University , Meizhou 514015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 merchants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kka region in northeast Guangdong , taking Beihou market as a center in Dapu county by Meitan river basin upstream of Han river. It belived the rise of market was because of geographic factors , an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 and on the other hand , due to regional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and local cultural prosperity. It brought huge economic benefits to local society , laid a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rise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 and made a profound impact on regional soci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Meitan river , on account of the market prosperity of trade and the merchant to rural society returns.

Key words: market; Hakka merchants;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ety